

周作人自編集：过去的工作



[周作人自編集：过去的工作_下载链接1](#)

著者:周作人 编，止庵 校

[周作人自編集：过去的工作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印刷优良，装帧精美，值得购买。

不错，图书促销买的，很划算！

慢慢收集周作人的自编集，目前收集了15本，为下一步看鲁迅全集做准备

包装到位，印刷清晰，纸张优良，值得购买。

要好好胡uu斤斤计较

好书，值得一读，老少咸宜

周作人的文字很喜欢，买来收藏

有点小！ 蛮好的！

不错的。。。。。

价格公道，快递给力，好评！

非常喜欢周作人的作品，活动时买的。在京东买书很放心。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宝贝下午才到，是给姑姑和妹妹买的，所以没看到，先好评啦，之后再追加吧！！！

这套书值得收藏， 很棒的

这套书陆陆续续，总算快出完了，感觉出版社太不爽快，早就校订好的书偏这么磨蹭。

知堂名作，必备。平和 散淡，回味绵长。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品给力，送货速度快，服务好

书很喜欢，就是价格有点贵

书很是精致，赞一个，很喜欢的。

这套周作人自编集还是不错的。还差几本就收齐了。

周作人的书，通俗易懂，好看，也值得看

一直在慢慢搜集这套书。有机会就买。

不好意思出差了，东东不错，

经典好书啊，无需多言，版本漂亮

周作人自編集：过去的工作

孩子很喜欢的一套书，买来看看

这本书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

这套书很棒，出一本买一本。

很喜欢 终于买到了 高兴

不错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为求全，一直在等这书。

好书，值得一读再读。。。。。

很好的书。我喜欢。

《周作人自編集：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非常满意，五星

这套书想买齐

以前不喜欢周作人,觉得他的文章太散太慢太淡,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可以接受他了.准备将这套《自編集》收齐。

为了收集全部三十五本全套而已。

果断集齐，很喜欢这一版的版式和装帧

小开本，感觉用一般的开本更好一些。

知堂老人的作品,读起来,颇有内涵

纸张 印刷都可以纸张 印刷都可以

书很好，作者博学大家，喜欢。

收藏用的，买买全！应该不错的！

出的速度太慢了。。。。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蕸）等人留学日本。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但是网站页面技术似乎欠缺，打开个页面搜索本书龟爬

I like this book!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

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槐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出生在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今绍兴鲁迅故居），籍贯属会稽县。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槐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

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弗）等人留学日本。

。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手持一封信交给鲁迅，信上这样说：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

鲁迅当然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携的二弟竟然会写出这样的信，兄弟失和并没有在周氏兄弟日记上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迹，据《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云：关于此事周作人在当日日记曾记有十字左右，后却被自行剪去；鲁迅在日记中也是含糊其词，只是在该月的14日记：“改在自室吃饭。”推测在此之前，周氏兄弟之间大概有过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不足以成为兄弟决裂的理由。所以一头雾水的鲁迅想问个明白，但“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眼看复合无望的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前的怡怡兄弟从此动如差商。

周氏兄弟失和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这里我不想过多描述，弄出个水落石出，一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了解的不太充分，未必有话可说；二来很多事情“因为年代太近，史料卷帙浩繁而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牘，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目录 ····· 关于竹枝词 谈胡俗 关于红姑娘 石板路 再谈禽言 关于遗令 读书疑 东昌坊故事 焦里堂的笔记 凡人的信仰 饼斋的尺牘 实庵的尺牘 曲庵的尺牘 过去的工作 两个鬼的文章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内容简介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牘，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 2作者简介编辑

周作人（1885—1967），中国散文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人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论文《人的文学》《美文》，新诗《小河》等在新文学运动中均有重大影响。所作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平和。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編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3编辑推荐编辑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懂生活之艺术的作家，他的散文是中国白话美文的标准，他的文章多篇入选国语老课本。

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化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周作人（1885—1967）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化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周作人（1885—1967）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化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周作人（1885—1967）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

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1898至1966年的作品，所有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读外国语。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浙江省视学、省立第4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北京大学南迁，他受时北大校长委托留在北平，不久为了保全北大财产而降日本。1939年任北大文学学院院长。1941年出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出狱，定居北京，1967年病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世界语。本世纪初即通过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向国人介绍。20年代曾任北平世界语学会理事长。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原名櫟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09年在东京结婚）。生了儿子周丰一（1907年病逝），女儿周静子，1929年夭折的女儿周若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周丰一和爱人张茭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新经典文化旗舰店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

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最全面的关于鲁迅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
最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资料 真实还原有血有肉的“人”之鲁迅 内容简介
周作人，鲁迅二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了解鲁迅的人之一。
《周作人自编集：鲁迅的故家》是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的重要著作之一，从“百草园”、“园的内外”、“鲁迅在东京”、“补树书屋旧事”四部分，记述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交游情状。不仅重笔勾勒活动于园内外的鲁迅，而且兼及背景中隐现的人事物，在其“生活着的空气”中，徐徐延展出一卷卷清末民初风俗画。文章沿承知堂怀人忆往之作平白真切、不落空言的风格，文字简洁朴讷，寥寥数笔，便曲尽人事物景情，为旁人所不及。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綬，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1885～1967）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櫟寿，又名奎綬，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局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原名櫟寿（后改为奎綬），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

、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1898至1966年的作品，所有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对于大部分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历史的读者，这似乎又是一个巨大声名主要来自于身后的俄罗斯作家。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伊萨克·巴别尔就已经是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了。而为他带来荣誉的，只是两部薄薄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当大多数苏联作家把眼睛盯着大时代、大事件时，巴别尔把视点坚定地落在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身上。在他的笔下人不再只是集体的一份子，更不仅仅是革命事业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有着复杂人性的生命体。残酷的战争环境常常让许多红军战士内心扭曲、变态，其中黑暗和兽性的一面令人为之心惊；但与此同时又无不渴望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梦想着甜蜜的爱情。

除了题材、内容方面的个性十足，质朴而生动的语言是巴别尔作品的另一个炫目的亮点。巴别尔要求自己的小说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斯丹达尔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追求的理想目标总结为“像法律文书一样精确”，他的《红与黑》、《帕尔玛修道院》也的确接近于这样的高度，而巴别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字的节省简直到了“吝啬”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加缪的作品才能与其媲美。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与巴别尔最相近的是海明威，读过《白象似的群山》后大概也会认同此观点。

《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毫无争议的代表作，由三十六个短篇组成。每篇小说既独立成章，彼此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这样的结构类似于福克纳的《去吧，摩西》，你可以把整部小说集当成一部长篇来看。我最喜欢其中的《多尔古绍夫之死》、《政委康金》、《盐》（据称是博尔赫斯最珍爱的作品）、《寡妇》、《拉比之子》、《千里马》、《吻》。尤其是《拉比之子》，对人物刻画之准确、巧妙都很有典型意义。

这是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绣像，而且两人的像并放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决议汇编中夹着一绺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の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满了犹太古诗。几页《雅歌》竟然和几发左轮枪子弹搁在一起。

一个半路出家的革命者内心的矛盾、纠结真是一目了然。
一九三九年，巴别尔因“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及“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间谍”的罪名被逮捕，严刑拷打后巴别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巴别尔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卡监狱被枪决。临刑前，巴别尔表示，“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当然，他没有得到满足。

说到陶渊明与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阒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雍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种类型。不仅对军国要务，就是日常琐细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经心。当时造船，他命人把剩下的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属下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到下雪的时候，才晓得他要用木屑来铺地防滑。后来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竹头做船钉。《晋书》评论说陶侃“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实在是“闲不住”的典范了。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搬砖”一事。封柴桑侯之后，陶侃在家无所事事，便找来一百块砖，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在优越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这样一个精力极度旺盛的人。无怪他后嗣众多，光儿子便有十七个。可惜过多的子女反而将父亲的优秀传统分散掉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经不及其父。陶渊明的父亲更是连名字都不载于史册。陶渊明虽然在当今名气胜过陶侃，但是以诗赋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实又逊于他的父亲。至于陶渊明的五个儿子，从陶的《责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没有成器。陶家在仕途上可谓一代不如一代。陶渊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异。陶侃精力旺盛、积极用世的优秀传统到陶渊明这里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不同的气质便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极度充沛，至陶渊明则走向消极、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自然对自己也不会放纵。《晋书》言陶侃对游戏娱乐深恶痛绝。他说：“擣菹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属下若有聊天娱乐，不认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菹博等娱乐之物取来，都扔到江里。如果是吏将，还要受鞭扑之刑。陶侃对饮酒也十分节制。《世说新语》载陶侃饮酒必自制其量。旁人问其故，陶侃解释说是年轻时酒后犯过过失，母亲命他约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饮。当然陶侃的话不一定全信。为官之人不愿饮酒，往往要找个托词出来。然而可以看出陶侃在饮酒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与之相反，消极、颓废者则往往放任纵情。陶渊明对于饮酒的狂热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驰的极端。

%D%A%D%A 祁克果：存在主义者。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重要个体，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存在”，唯有通过重要的选择才能和自我存在关联。真正重要的真理是属于个人的，即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回答的（上帝是否存在，他是否爱我），而由理性可知的事情是不重要的（ $1+1=2$ ）。所以宗教信仰重要，但又无法用理性去解释。

%D%A %D%A

祁克果人生三阶段：美感阶段（从美感角度看待现实，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只重视是否有趣，如典型浪漫主义者）<>焦虑空虚->道德阶段（对生命抱认真态度，始终一贯做符合道德的抉择，重视是非对错）<>厌倦->宗教阶段（选择信仰，不选择美感的愉悦和理性要求的责任） %D%A %D%A %D%A

自然主义：除了大自然和感官世界，别无他物。只相信自然现象，而不信任何理性假设或圣灵启示。（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 %D%A %D%A

马克思：哲学不仅诠释世界，也应用来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变化是推进历史的力量，物质决定精神关系。社会基础决定上层结构，同时二者有辩证的互动。社会基础的三个阶层：生产条件（自然条件）、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生产关系（分工和财产分配）。是非观念是社会基础的产物，尤其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决定的，因为人类

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人在劳动时与自然有互动的辩证关系（互相改造），而资本主义社会让劳动变成他人工作，并被剥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矛盾（生产力越来越强，劳动者购买力越来越弱）将使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马克思有经济学错误，同时没有重视人对大自然的掠夺。他之后分流为社会民主主义（西欧渐进和平式）和列宁主义（暴力）。 %D%A %D%A

达尔文：青年时期的环球探险，安第斯山内陆的海洋古生物化石，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物种隔离。《物种起源》。进化论：动植物都是从原始生物进化而来，进化是自然淘汰差异个体的结果。个体差异的原因是遗传与突变。远古无氧环境和无臭氧遮挡宇宙射线才能让第一个DNA细胞形成（氧气氧化性太强），因此现今世上所有生命都是同源的，也不会有新的生命形成。但进化似乎并非完全偶然，而是朝着复杂神经、大脑的方向，眼睛这样的精密是仅仅物竞天择也难以解释。 %D%A %D%A

弗洛伊德：人与环境有不断的紧张关系，这种冲突存在于人的驱策力、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驱策力是指人的非理性冲动（例如从婴儿开始就有的性冲动），在无从查觉得情况下主宰人的行动，而非由理性。人刚出生时，会用直接无羞耻的方式满足身心需求，这种快乐原则称为“本我”。长大过程中学会调整快乐原则来迁就现实环境原则，发展出了具有调节功能的“自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道德要求（例如良心、对性的罪恶感）也成为内心一部分，称为“超我”。三个“我”之间的冲突经验是精神官能症之源，弗洛伊德通过溯源冲突来治愈。 %D%A %D%A

潜意识：人类的意识只占心灵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因为与意识或超我冲突而被压抑的经验想法，即潜意识。被压抑的想法经验总试图重新进入意识，因此会有口误、谎称动机把事情“合理化”（不愿承认真正动机）、投射（把内心试图压抑的特点转移到别人身上）的现象。压抑过强易患精神疾病，排除压抑管制的潜意识自由联想是治疗之道。

止庵编的这套书，文章全面完整，书设计清白雅致。喜爱周作人作品的值得一存。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

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浙江省视学、省立第4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北京大学南迁，他受时北大校长委托留在北平，不久为了保全北大财产而降日本。1939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1年出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出狱，定居北京，1967年病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世界语。本世纪初即通过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向国人介绍。20年代曾任北平世界语学会理事长。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周作人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荊）等人留学日本。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周作人周作人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荊）等人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留学回国执教北大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周作人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

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此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

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

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曲庵的尺牋》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过去的工作》- 写作背景

《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牋》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过去的工作》- 主要内容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

《过去的工作》- 出版情况

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曲庵的尺牋》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来，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啾，屋子的一切，便好似蒙在鲛觚之中的那般波动，软艳！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逐句地看完这个书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震撼啊！为什么会有如此好的书！在看完这书以后，我没有立即回复，因为我生怕我庸俗不堪的回复会玷污了这网上少有的书。能够在如此精彩的书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您书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

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书太好看了！我愿意一辈子的看下去！这篇书构思新颖，

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

，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就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这篇书不算太成功

，但它的实验意义却远远大于成功本身。正所谓：“一马奔腾，射雕引弓，天地都在我心中！”真不愧为无厘界新一代的开山怪！

本来我已经对这个社区失望了，觉得这个社区没有前途了，心里充满了悲哀。但是看了你的这个书，

但是看了你的书，我告诉自己这个书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啊！

苍天有眼啊，让我在优生之年得以观得如此精彩绝伦的书！，你要继续努力啊

此书，就好比黑暗中刺裂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一瞬间就让我如饮甘露，让我明白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着的。

只有这样具备广阔胸怀和完整知识体系的人，才能作为这真理的唯一引言者。看了的书，让我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中，我认为，如果不把的书顶上去，就是对真理的一种背叛，就是对谬论的极大妥协。因此，我决定义无反顾的顶了！

真知灼见啊！的书实在是一句中地。子曰：三人行而必有我师焉。斯言善哉。不知不觉上网这么多年，好的坏的书都看过了，看多了。渐渐的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渐渐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奋斗的顶峰了。可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书的时候，我的眼前竟然感觉一亮！

仿佛看到了倾城倾国的美人，正轻摇柳步款款而行。正好似的这个书，语态端正，论证从容。好啊！只有那种真理在握，洞视这个世界真实本质的人，才能显示出这样惊人的笔力。

在日益苍白肤浅的网络里，我从的书中不但看到了真理，更加看到了网络的希望。为表达我对的敬意，也是为了向学习。文笔流畅，修辞得体，深得魏晋诸朝遗风，更将唐风宋骨发扬得入木三分，能在有生之年看见的这个书。

实在是我三生之幸啊。看完的这个书之后，我竟感发生出一种无以名之的悲痛感DD啊，这么好的书，

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复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书，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的心血吗？看完，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复，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希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怎么了，正是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面对的书，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的翻开书

《知堂乙酉文编》一九六一年二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此书与《过去的工作》原系一书，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编订旧稿为一部二册，曰‘乙酉文编’。”即此是也。查周氏当时手订目录，其中十五篇后来收入《过去的工作》，十篇收入《知堂乙酉文编》，而《关于竹枝词》两书重出。原目录中《关于东郭》、《佐藤女士的事》、《□□□生老母》和《重来者之可怕》，两书均未见，后二篇已佚。《知堂乙酉文编》中另有七篇未在目录之列，即《孔融的故事》、《小说的回忆》、《报纸的盛衰》、《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谈文章》和《关于覆瓿》，《谈文章》末署“乙酉六月”，其实初稿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关于覆瓿》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其余五篇则为四十年代末所写。一九四五年的十篇，作于四月至十一月间（《古文与理学》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其中抗战胜利后一篇，只有少数几篇当时发表过。

《知堂乙酉文编》中一九四五年之作，与《过去的工作》风格相当，“古怪题目”如《无生老母的消息》，“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都颇具分量。《北京的风俗诗》、《关于竹枝词》和《关于近代散文》，谈的都是作者一向爱好与关注的东西，同时也提示我们，此老尚有两大佚著，一查周氏日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云：“下午编《北京竹枝词集》了。”七月二十四日云：“编《近代散文》。”七月二十七日云：“编《近代散文》全了。”七月三十日云：“下午长谷川来，交予《近代散文》稿。”可惜未能刊行，均已失传。至于那几篇后来写的，内容多涉回忆，文字亦较通俗浅近，已可看出晚期作品气象了。《知堂回想录·

从不说活到说话》云：“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即使本来没有加进去诗的描写，无意中也会出现一种态度，写出来夸张不实的事来，这便是我在乙酉（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写一篇《谈文章》里所说的，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即是作态。……对于这种毛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笔来绷着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样子，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按《谈文章》或系此时改定，如同别处关于思想有所总结一样，该文堪称周氏一生为文的总结，而“不作态”正是其散文作品的最大特色。天下文章可以作者的态度分为两类，适用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写作一阅读模式。其一是写文章与读文章，这时文章只是表现情感思想的手段而已，周氏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本色》）即是这个意思。其一还是写文章与读文章，不过作者以写文章为演戏，读者以看文章为看戏，双方觉得解气的都在字句之形容渲染上。这时好似作者支配读者，其实恰恰相反，作者以对读者产生效果为写作目的，可能产生的效果左右着他的写作，于是也就丧失了自我。区别在一真一假。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周氏都拒绝接受后一模式，所以他一方面说，“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情书写法》）一方面又说，“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

关于写文章》)多半还是因为忍受不了当这样的读者,才不愿意去当这样的作者的。而他进一步看出,作者作态不光为了制造效果,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所要表现的东西本身分量不够,所以才借助表现来掩饰一点,增添一点,所以他说:“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本色》)归根结底这是自信与否的区别。本色好,所以才自信。此次据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作者照片及手迹二页,目次二页,题记一页,正文一百五十四页。目次、正文中“无生老母的消息”均作“无生老母的信息”,兹据手订《乙酉文编》目录改正。

有关知堂《过去的工作》

坐在窗前肆意翻阅,糙黄的纸页间别有一种历尽劫波的简约澹定。由此又不由得想起平素一些毫无因由的胡乱臆想来,总觉得知堂的文字不能印在太新太奢华的纸页上,比如如同是钟叔河先生整理的《知堂书话》,最初岳麓书社的本子就相当耐看,九十年代后海南出的新印本尽管篇目有所增加,然而高文大册,堂堂皇皇的两本大书,恐不能得以清涩冷淡为人生趣味的二先生的首肯罢,至于坊间最近犹能得见的人大版《书话》,则又等而下之矣。

再如止庵先生零二年在河北教育整理出版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不能说没有下功夫,每册前的编辑小引,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这套书的开本,版式自有它的胜场,封面设计也有独到妙境,不过似乎是过于小资了一点,风雅了一点,须知这种情调乃是“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苦雨斋极力避免的事情。

于是乎说来说去,四九年后,准确地说是七九之后,知堂各种新印的文集选本还是以钟叔河先生主持下的岳麓版最为耐看。钟先生那一套知堂集子,封面素雅简明,又以当年原版文集封面为暗花,此外仅集知堂文字以为题笺,空旷悠远,实在是回味无穷。可惜历年来辛苦收集,所得不过区区六七种而已。

再有就是当年港澳等地的本子比较可喜了。

回到这本《过去的工作》来,集中的文章几乎是成书前都未曾发表过的,也许孤寂无言心境下的这些产物更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番抚慰与娱乐,是以无虚伪,少掩饰,不做作,也唯其如此,多年后再反观这些文字,会倍觉有情。隽永、绵长、自如、平和,知堂后期的文字,这集里的算得上精华了。

翻翻图版,翻翻目录,翻翻正文,突然觉得有一丝诧异,好像和止庵交代的一些细节略有出入。急忙找出河北教育的小册子,仔细一看,果然有些令人不解之处。

止庵的前言说这本过去的工作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并引周氏自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下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而手里的这一本《工作》封底署名为周作人,出版者为澳门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五月版。后出者不知与香港新地出版社有何联系。

其二,河北本乃据五九年初版本整理出版。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是“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曲庵的尺牋》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澳门本同样有照片墨迹八页,内容却有所不同,依次是:作者照片(非上书所谓苦雨斋前影像,而是近似于标准登记像的规格,年代当在解放后),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十六),作者为省斋先生书集放翁句联语一付,(文曰“多难只成双鬓改,浮名不作一钱看”且有跋语若干),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内容为《苦茶庵打油诗》二二,二四“山居亦自多佳趣”、“镇日关门听草长”两章),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同样的,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澳门本相较于香港本,墨迹有四幅不同。不知这本《过去的工作》是否是当年港,澳地

區翻印本盛行風潮下的產物。

不管此與彼有什麼不同，寒齋得以有緣珍藏，亦清福無限矣，書此一段，既志己之欣然，更求識者教我，幸甚，幸甚。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

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

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在中國學術史上，從清代的乾隆、嘉慶兩朝到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樸學大興，因之而有乾嘉學派之稱。董理乾嘉時期學者的別集，於研究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國家圖書館珍藏了諸多乾嘉名人的抄稿本，因之整理和出版這些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不僅在文獻方面可為清代文學、學術史等的研究提供較為完整的珍貴資料，而且也將充分展現這些稀見抄稿本的版本價值。本叢刊選輯了乾嘉時期六十二家著名學者的別集八十九種，如桐城派初祖方望溪之《方靈皋遺文》，嘉慶、道光間總結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之王念孫《王念孫遺文》、錢大昕之《南陽集》等等。本叢刊是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項目。

作者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是诚实的表现，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坐在窗前肆意翻阅，糙黄的纸页间别有一种历尽劫波的简约澹定。由此又不由得想起平素一些毫无因由的胡乱臆想来，总觉得知堂的文字不能印在太新太奢华的纸页上，比如同是钟叔河先生整理的《知堂书话》，最初岳麓书社的本子就相当耐看，九十年代后海南出的新印本尽管篇目有所增加，然而高文大册，堂堂皇皇的两本大书，恐不能得以清涩冷淡为人生趣味的二先生的首肯罢，至于坊间最近犹能得见的人大版《书话》，则又等而下之矣。

再如止庵先生零二年在河北教育整理出版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不能说没有下功夫，每册前的编辑小引，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这套书的开本，版式自有它的胜场，封面设计也有独到妙境，不过似乎是过于小资了一点，风雅了一点，须知这种情调乃是“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苦雨斋极力避免的事情。

于是乎说来说去，四九年后，准确地说是七九之后，知堂各种新印的文集选本还是以钟叔河先生主持下的岳麓版最为耐看。钟先生那一套知堂集子，封面素雅简明，又以当年原版文集封面为暗花，此外仅集知堂文字以为题笺，空旷悠远，实在是回味无穷。可惜历年来辛苦收集，所得不过区区六七种而已。

再有就是当年港澳等地的本子比较可喜了。

回到这本《过去的工作》来，集中的文章几乎是成书前都未曾发表过的，也许孤寂无言心境下的这些产物更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番抚慰与娱乐，是以无虚伪，少掩饰，不做作，也唯其如此，多年后再反观这些文字，会倍觉有情。隽永、绵长、自如、平和，知堂后期的文字，这集里的算得上精华了。

翻翻图版，翻翻目录，翻翻正文，突然觉得有一丝诧异，好像和止庵交代的一些细节略有出入。急忙找出河北教育的小册子，仔细一看，果然有些令人不解之处。

止庵的前言说这本过去的工作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并引周氏自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下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而手里的这一本《工作》封底署名为周作人，出版者为澳门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五月版。后出者不知与香港新地出版社有何联系。

其二，河北本乃据五九年初版本整理出版。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是“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澳门本同样有照片墨迹八页，内容却有所不同，依次是：作者照片（非上书所谓苦雨斋前影像，而是近似于标准登记像的规格，年代当在解放后），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十六），作者为省斋先生书集放翁句联语一付，（文曰“多难只成双鬓改，浮名不作一钱看”且有跋语若干），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内容为《苦茶庵打油诗》二二，二四“山居亦自多佳趣”、“镇日关门听草长”两章），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

丙编之《鬼物》二首)；同样的，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澳门本相较于香港本，墨迹有四幅不同。不知这本《过去的工作》是否是当年港、澳地区翻印本盛行风潮下的产物。不管此与彼有什么不同，寒斋得以有缘珍藏，亦清福无限矣，书此一段，既志己之欣然，更求识者教我，幸甚，幸甚。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关于竹枝词》又见于《知堂乙酉文编》。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遂告结束。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板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浅谈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海里有鱼)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除了三十几首新诗和二百来首旧体诗外，全部都是散文。它的散文有杂感、文艺短评、随笔等类。其中，影响较大，艺术成就较高，风格也较成熟的，还是他那些以冲淡平易见称于世的美文小品。他这些美文小品，不仅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精湛的艺术造诣。同时，也形成了周作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一

周作人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平淡自然、和平冲淡、闲适……这些说法都是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概括。周作人自己也曾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

①“平淡自然”，这是周作人给自己散文风格所作出的定位。“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②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不仅如此，他给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言中，也一再地强调、推崇冲淡平易的文学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冲淡平易，不仅是周作人希望达到的境地。同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冲淡平易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的散文，多写周围的日常生活，他常写一些人人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象同友人拉家常，叙旧情。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徐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如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大多是如实的记事，虽也有内心的感情，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最激烈也不过是说一些这样的话：“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则是人功。”③，“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两位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④。周作人关于事件本身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周作人却能冷静沉着，通过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悲愤。这就是周作人散文的冲淡平易之处，他使人读他的散文，一点不觉得艰难，甚至觉得有些浅显。然而，正是这样，才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毫无戒备和疑问中，服服贴贴地接受他思想感情的影响。

我们说周作人的散文是冲淡而不是平淡，还在于周作人的散文是有思想的，它并不让人觉得苍白贫乏。周作人虽然说不上是卓越的思想家，但对于许多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与非、曲与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他都能判断分明，做到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其深刻性往往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也正是他的散文不显疲弱，比较耐读的主要原因。当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之后，社会各阶层对他有种种评价。其中不乏恶意的攻讦和指责。周作人即明确指出：孙中山不是“神人”，“也有缺点”，却应“整个地去看出他的伟大来。”如《故乡的野菜》，在艺术手法上可以说完全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用白描而能写出真挚的感情，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文章开头，周作人便声言他对于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份，只因为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到他。待我们读完全文，便会发现周作人对野菜的谈论，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的深情。周作人散文创作表现出的冲淡平易，决不是直露平庸，更不是淡而无味，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感情。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有感情，这对于诗和散文尤其如此。问题是，周作人散文中感情的流露有其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抒情的淡化和节制。周作人的散文，总是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写成似乎颇不经意。

《周作人自编文集》编辑杂记 止庵

我把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视为一生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整整忙了两年时间。我读苦雨斋的书，始于十五年前，最早接触的是上海书店影印的三种，即《知堂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和《过去的工作》，内容不说，单那形式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以后读到周氏著作各种选本，都不能令人满意。作者生前编定一本本集子，无不花费一番心思。而且不像鲁迅惯用编年方法，一本书中文章排列顺序，乃是别有安排

，好比营造一种语境，后人打散重编，这语境也就破坏了。岳麓书社曾经大致依照原样出过其中十几种，说来甚合我意，可惜中止了；如果当初此事得以完成，我倒是乐得只当读者。而没来得及出的那些，却是平常不大容易见到的。一度我打算接着做下去，先是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内收《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继而计划把自《秉烛谈》至《过去的工作》各集合刊一部“知堂十种”，却未能如愿。后来再读岳麓版诸书，觉得装帧未免简陋，校改略嫌过头，所以下决心整个儿重做一遍。恰好与出版社方面不谋而合，于是就动手做起来了。

“周作人自编文集”这题目上来即已拟好，意味着划定一个范围。集外单篇文章还有很多，后人汇录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和《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前部分）出版，虽然尚不齐全，已有二百多万字了，一一只是将作者自编《木片集》当作“集外文”拆散收入《四九年以后》，未免荒唐。整理出版周氏的集外文，诚为必要之举；然而周氏的集外文与集内文，严格讲并不具有同等价值。特别是早中两期，当时他出书实非难事，之所以不打算收入集内，想必有其一番道理。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譬如《秉烛谈》有《明珠抄》一组，篇末云：“《明珠抄》十九首，本是念五年冬间为《世界日报》‘明珠’栏所写，今因上海兵燹，原稿散失，重检得六篇收入，皆是年十二月中作也。”另外那十三篇，或许本有收录的可能；但是像《苦口甘口·遇狼的故事》所说的“此次又复谈起狼来，陆续写了数千言，近来想要编集，这种文章照例是不适用”，显然与之不可同日而语。这当然只是作者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未必不应予以尊重，至少也当引为参考；我读后人所编分类或编年本子，集内外文混在一起，似乎不甚妥当。至于晚期文章很少收集，部分或是出于无奈，但是我们无法代为甄别；而且将自编《木片集》与当初报纸刊文加以对照，字句改动颇多，从这一点考虑，集外文与集内文也有区别。此次只整理出版作者亲手编就的集子，就是这个道理。

严格说来，“自编文集”这名字需要打些折扣，至少得加个定语，即校订出版的只是“现存的”周作人自编文集而已。曾面世者，未面世者，凡是目前确实找不到的，也就不在此列。而这颇有几种。据《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记载：“在乙卯年十月里，将那讲希腊的几篇抄在一起，加上一个总名《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有关周氏的传记论著谈及《异域文谈》，往往闪烁其辞，从不超出《知堂回想录》的介绍范围，我想作者其实未曾寓目。此书遍觅不着，或已失传。此外散失的书稿，尚有《桑下谈》（1937年）和《绍兴儿歌集》（1958年）两种；1945年还曾写有一本笔记，也已亡佚。记得周劭著文说“文革”后见过知堂一部手稿，题为《秋镫小抄》，或即为该书欤，然早已不明下落。除去这些，周氏自编文集共计三十六种，都收入这套丛书了。

以上讲了许多，可以归结为“存真”二字。我编订周氏翻译作品为《苦雨斋译丛》（已出十种），即遵循此一原则，这回也不例外。所以尽量选取较好版本；编次内容，则一律依照原样。所谓“较好版本”，即从后不从前，以作者最终确定的形式为准。譬如《自己的园地》最早由北京晨报社印行，以后作者重加编订，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次遂选择后者作为底本。当然“较好版本”只是相对而言，不一定尽善尽美，此时存真就成了最高标准。周氏各书面世于不同时期，受当时特殊情况影响，或有不尽如人意处，好比为《秉烛谈》所作序言，该书出版时未及收入，而编进《秉烛后谈》；《秉烛后谈》的序言，则编进《立春以前》。凡此种种，皆一仍其旧。当然调整一下轻而易举，然而也就违背尽量存真的初衷了。其实此等处最能见着时代痕迹，保留不无意义。另外《知堂乙酉文编》与《过去的工作》本系一书，题为《乙酉文编》，由曹聚仁析而为二，以谋出版；此事发生在作者生前，可以认为是经他默认了的，因此也就保留原样。总之整理前人著作，除必要之举外，编者个人色彩愈少愈好，这是我的“编书观”。当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干了。这也可以举个例子，《苦雨斋序跋文》中，《点滴序》与《空大鼓序》二文原来内容颠倒，张冠李戴，当系编辑失误造成，这次便掉换过来。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

，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祿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余》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俎》《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科目之蔽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余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护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

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界，春天恰如其分。那个春天百花齐放，其间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枝并蒂花，这即是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以其杰出的创作成绩，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时。然而，几十年之后，这枝并蒂花凭空折断了一朵：人们只认识鲁迅，不知道周作人了。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年日军入侵中原，作为留平教授，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迁，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可见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还是呆在沦陷区，并担任伪职，令文化界一片哗然。于是，冠上了“附逆”“汉奸”的头衔。关于这一段历史，历来争论不一，解放后，周作人也曾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作过诸多解释，却难以抹去留在人们心中的污点。而其兄鲁迅，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英雄，流传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俩念私塾，读古书，进洋学堂，后东渡留学，几乎一样的经历，而命运如此不同，实在是性格不同所致，也无怪乎后来兄弟反目成仇了。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然而，我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这是套用鲁迅评价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的话。鲁迅人如其文尖刻犀利，除了自己谁都骂。而周作人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平和宽容的美，这种美溶入其散文，便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周氏的散文一般为闲话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苍蝇”，无所不谈。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似乎借鉴了不少。周氏的散文以文人的情趣格调为基础，因而欣赏其文也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的人慕名来读，开始一定失望至极，认为象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味，闲得无聊。然而，等你稍稍深入散文这片田地之后，再回头来读周氏的文章，便会发现一种不可言说的，正在其平淡闲适之间。

周氏的散文，大多创作于二十年代，如《初恋》，《故乡的野菜》，《苦雨》，《谈酒》等。譬如《初恋》，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初恋的特征，并且道出了当时微妙的心理感觉。宋姨太太说阿三那小东西不是好货，将来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周作人当时听了心里想着：她如果真的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后来阿三患霍乱死了，周作人听了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会做婊子了。《故乡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场买菜看到荠菜，回忆起故乡的野菜，这些都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经他逐一介绍，串以民歌俗谚，点缀乡间风物，却有一种自然朴实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乡来。《苦雨》是给周伏园的书信，记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气，自己很不喜欢，听不惯雨声，因为屋漏，又担心书被淋湿，睡不安稳。然而这种苦也是淡淡的，称不上厌恶。他还谈及小孩子们的喜雨和青蛙的叫声，其实还有几分喜雨的新鲜意思呢！《谈酒》一文中，自己虽不会喝酒，却是感兴趣的，因而也要说一说，以其“微薄”的经验，感觉喝酒的乐趣在当杯的一口，谁又能说不是呢？对与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作人正是以这种平淡的风格，开拓了散文的意境，他以艺术的眼光来品味生活，抒发独特的审美情趣，大有明清“性灵”小品的味道，是艺术化的美文。

在文艺观上，周作人与鲁迅几近敌对。他认为文艺是个人的事，客观的影响社会，但绝不是万能的救世药，没有功利性。然而，尽管不愿牵涉政治，却终被时世所牵连，致使数十年来人们不敢问津。不过，在那样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周作人躲在书房里不问世事，实在不应该。他那时的散文，所谈及花鸟鱼虫，闲适消极，逃避现实。然而其趣味性，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却是很好的消闲品。这种文章表现的是一家之言，有很强的个性魅力。如《苍蝇》一文大谈那脏东西，小时候有点喜欢，现在讨厌，客观予以评价，还谈及古今中外对苍蝇的态度，很长见识。

周作人的散文还有另一类，笔记式的。他曾写过回忆录，其中记述人物的最为出色。他回忆北大红楼内外的名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有些连面也没见过，单凭传说，所记也大都是趣闻轶事，言语诙谐，却很能传达人物的思想精神，表现了幽默的一面，在周氏的散文中并不多见。

如记述刘叔雅善骂的特点，关于中医的：你们骂中国的中医，实在大错而特错，要知道在现今的中国，有多少的遗老遗少，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而他们的性命全掌握在这一班大夫手里，所以，你们怎么好意思去骂他们呢？

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界，春天恰如其分。那个春天百花齐放，其间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枝并蒂花，这即是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以其杰出的创作成绩，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时。然而，几十年之后，这枝并蒂花凭空折断了一朵：人们只认识鲁迅，不知道周作人了。

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年日军入侵中原，作为留平教授，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迁，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可见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还是呆在沦陷区，并担任伪职，令文化界一片哗然。于是，冠上了“附逆”“汉奸”的头衔。关于这一段历史，历来争论不一，解放后，周作人也曾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作过诸多解释，却难以抹去留在人们心中的污点。而其兄鲁迅，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英雄，流传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俩念私塾，读古书，进洋学堂，后东渡留学，几乎一样的经历，而命运如此不同，实在是性格不同所致，也无怪乎后来兄弟反目成仇了。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然而，我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这是套用鲁迅评价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的话。鲁迅人如其文尖刻犀利，除了自己谁都骂。而周作人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平和宽容的美，这种美溶入其散文，便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周氏的散文一般为闲话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苍蝇”，无所不谈。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似乎借鉴了不少。周氏的散文以文人的情趣格调为基础，因而欣赏其文也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的人慕名来读，开始一定失望至极，认为象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味，闲得无聊。然而，等你稍稍深入散文这片田地之后，再回头来读周氏的文章，便会发现一种不可言说的美，正在其平淡闲适之间。

周氏的散文，大多创作于二十年代，如《初恋》，《故乡的野菜》，《苦雨》，《谈酒》等。譬如《初恋》，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初恋的特征，并且道出了当时微妙的心理感觉。宋姨太太说阿三那小东西不是好货，将来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周作人当时听了心里想着：她如果真的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后来阿三患霍乱死了，周作人听了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会做婊子了。《故乡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场买菜看到荠菜，回忆起故乡的野菜，这些都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经他逐一介绍，串以民歌俗谚，点缀乡间风物，却有一种自然朴实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乡来。《苦雨》是给周伏园的书信，记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气，自己很不喜欢，听不惯雨声，因为屋漏，又担心书被淋湿，睡不安稳。然而这种苦也是淡淡的，称不上厌恶。他还谈及小孩子们的喜雨和青蛙的叫声，其实还有几分喜雨的新鲜意思呢！《谈酒》一文中，自己虽不会喝酒，却是感兴趣的，因而也要说一说，以其“微薄”的经验，感觉喝酒的乐趣在当杯的一口，谁又能说不是呢？对与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作人正是以这种平淡的风格，开拓了散文的意境，他以艺术的眼光来品味生活，抒发独特的审美情趣，大有明清“性灵”小品的味道，是艺术化的美文。

在文艺观上，周作人与鲁迅几近敌对。他认为文艺是个人的事，客观的影响社会，但绝不是万能的救世药，没有功利性。然而，尽管不愿牵涉政治，却终被时世所牵连，致使数十年来人们不敢问津。不过，在那样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周作人躲在书房里不问世事，实在不应该。他那时的散文，所谈及花鸟鱼虫，闲适消极，逃避现实。然而其趣味性，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却是很好的消闲品。这种文章表现的是一家之言，有很强的个性魅力。如《苍蝇》一文大谈那脏东西，小时候有点喜欢，现在讨厌，客观予以评价，还谈及古今中外对苍蝇的态度，很长见识。

周作人的散文还有另一类，笔记式的。他曾写过回忆录，其中记述人物的最为出色。他回忆北大红楼内外的名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有些连面也没见过，单凭传说，所记也大都是趣闻轶事，言语诙谐，却很能传达人物的思想精神，表现了幽默的一面，在周氏的散文中并不多见。如记述刘叔雅善骂的特点，关于中医的：你们骂中国的中医，实在大错而特错，要知道在现今的中国，有多少的遗老遗少，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而他们的性命全掌握在这一班大夫手里，所以，你们怎么好意思去骂他们呢？

总之，周作人的散文是纯粹的，自由的，无功利的艺术品。我相信，这是一种超越阶级

的文字，能得到长远的流传.

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

东西很不错，量又足，京东的自有快递很给力，包装也不错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_下载链接1_](#)

书评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_下载链接1_](#)